

# 面对短痛的时刻到了

## ——尹国新代表细说纺织产业振兴

■本报记者 蒋茜

危机袭来,通常人们都认为做内贸的企业受冲击小是正常的,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具有竞争力是应该的,可是一家“几乎全部是出口、全部是贴牌”的企业也一样活得好好的。3月8日,它的老总——全国人大代表、晨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国新淡淡地告诉本报记者:“我们的订单已经接到9月份了。”

“今年1-2月,企业出口额增长4.07%,利润还可以。”尹国新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是世界一流,生产效率也是世界一流,这样就有抵御危机的能力了。”

不过,尹国新认为“最好的机遇并不是说这个时候把企业做多,赚多少钱,我认为整个产业可以借这个时机来调整。”

尹国新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从行业的角度,他谈了些自

会“招骂”的观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上服装企业的统计显示,2008年1至11月份,规模以上企业亏损面达22.77%,比上年同期提高了3个百分点。而记者最新获取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以外贸加工为主的100人以内的小型服装企业三成以上都关停了。

“假如面对现在这样的情况,忘记产业调整这个词的话,等经济复苏后再调整,那肯定就不行了。”他说,“近期政府出台的纺织工业调整振兴规划还是蛮有道理的,有调整两个字让我感觉很放心。”

“政府要扶持的应该是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并不一定是大企业。”不过他也指出,“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小企业确实高得不是点半点,要高出30%到40%。”

“中国纺织服装行业一直在怪圈中循环,不管什么价格的订单都有人接,因为产能这

么大,企业太多,恶性竞争。我们喊了好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如果能通过这次危机优胜劣汰,对行业来说未必是件坏事。”他说,“短痛是大家必须要面对的。”

“纺织服装行业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行业之一,而现在我国纺织服装企业的竞争对手不仅在国内,还在亚洲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孟加拉、越南、柬埔寨。”“要让我们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强,这次是个机会。”尹国新说。

关于自己的企业,尹国新直言目前没有创品牌的打算。“生产做的是产品,品牌做的是商品,这是两个事业,没有高低之分。国外很少有品牌是生产型企业在做的,基本都是设计型企业做的。”

他认为,做品牌涉及大量的宣传费、维护费、建立渠道的费用等等,还要承担销售风险,相比之下贴牌的成本和风险就要低一些。“所以并不是每个企业都适合做品牌,有实力

的企业当然可以去做。而且培育一个品牌要像培育一个孩子那样来做,要有足够的耐心。”

“我只做贴牌。”尹国新说,“社会越进步的话,分工会越细。虽然产业链每一段的利润空间大小都不同,但是不管做哪一段,你做到最优秀的时候,我相信无论是话语权还是生存空间,都会很好。”

“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这个例子经常被引用来说明类似服装纺织这样低附加值的产业是多么“亟待调整”。对此,尹国新不认同,“不能简单地用价格或是利润率来衡量一个行业的价值,我们国家低学历的农村人口这么多,不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怎么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

至于工厂的未来,尹国新的计划是在环境、厂房、设备上都要做成世界一流,不仅要在四个细分领域生产世界一流的产品,还要让工人在美好的环境中愉快地工作。“我从来不把工人当做成本,工人是工厂的主体,你对他们好了,他们也会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在晨风,工人的食、住以及过节回家的车费都可以报销。

“老有人问我,你从事的不是朝阳产业,接下来怎么办?我说我做了20多年了,都没有想过这个产业是朝阳还是夕阳,唯一的感受就是我们做的是朝阳产业。社会越进步,这个产业会越兴旺。”尹国新肯定地说,瘦削的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



宋春丽委员:  
文化产品应有积极引导作用

著名演员宋春丽委员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人们回归电影院有积极作用,因为当人们感到精神压力较大时,更需要文化的东西来释放精神压力。好的电影,就是用积极的文化引导人们积极工作和生活。”

本报记者 许之丰 摄

李立新委员呼吁要避免  
农民工因信息闭塞造成伤害

## 政府要及时提供 就业信息

本报讯(记者陈华)“是因为信息闭塞害了他们啊!”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利时集团董事长李立新利用两会间隙去北京西站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调研,期间,一位50多岁的农民工的哭泣声让他心生如此感慨。

数天前,这位来自北京通州区的农民工和另外4位同乡来到一家公司打工。原本那家公司说好月工资1000元。然而10天过后,他们发觉没有任何可以拿到工钱的迹象,所以决定卷好铺盖回家。

作为一家拥有3000多名农民工职工的企业负责人,李立新委员对农民工问题一直深为关注。李立新委员认为,让更多农民工及时掌握农民工输入地的用工信息在当下尤为急迫,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返城农民工因信息闭塞而受到伤害的事情反复发生”。

在北京西站,李立新委员现场询问了很多前来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当被问到来北京之前有没有联系好可以去打工的地方,很多人都说没有联系好。

“农民工找工作,其实有‘三怕’。怕找不到工作,怕找到工作后拿不到钱,怕拿到的钱不够自己的生活开支。”李立新委员说。为什么农民工有这“三怕”心理,还盲目地来城市找工作,他认为“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可以利用的信息,只能过来硬闯”。

此前,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已经将原定2月底结束的“春风行动”延长15天,目的是让更多外来农民工享受免费的就业服务。李立新委员特别赞赏北京市劳动部门在火车站、汽车站等农民工流入集中的地方设立“农民工就业服务咨询点”的做法。他认为“这对于那些急于找工作又没有明确目标的农民工来说,提供了就业的方向”。

李立新委员说,“很多农民工既没有预先寻找用工信息的习惯,也缺乏寻找用工信息的条件,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做好就业信息的搜集与传播工作。”他认为“不仅农民工输入集中的城市要做好服务,农民工输出地也要同步做好相关就业信息服务工作”。

# “宁可现在做恶人,也不能做历史罪人”

环保部:“两高一资”项目坚决不批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记者王冬梅 毛浓曦)今天,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透露,对存在环境隐患的总投资1040亿元的14个化工、石化、钢铁、火电、造纸等项目实行了暂缓审批或者不予批复。他表示:“我们宁可现在做恶人,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一定要严格把关!”

吴晓青强调,涉及到不能审批和严格控制的项目,以及“两高一资”产能过剩的项目,这是一条红线,也是一条高压线,不能碰,更不能越线。

与此同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表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这九个字是一体的,切不可简化为三个字,即“保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在研究出台这九个字的时候,态度非常明朗,不可以再搞“两高一资”项目,在保增长的同时,地方也不能搞。

张力军说,中央陆续研究制定10个行业的调整振兴计划,其中充分体现了“调结构”,调结构就是要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高污染、高能耗的工艺。这种淘汰是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而且中央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看作是调结构的机遇,要

充分利用好这个机遇。

吴晓青表示,保证节能减排措施的落实是环保部门现在考虑的重中之重。他介绍,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建设项目设置了“防火墙”,归纳起来是“四个不批、三个严格”。

吴晓青介绍,“四个不批”,即国家明令淘汰、禁止建设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一律不批;环境污染重,产品质量低,能耗、物耗消耗高,特别是污染物排放不能达标的项目一律不批;环境质量不能满足环境功能要求,尽管是好项目,但当地环境质量已不能满足环境功能要求的,已经没有总量指标了,一律不批;建设项目如果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一律不批。

“三个严格”,即严格限制涉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保护区以及重要生态功能区的项目严格限制;严格控制高耗能,就是产业开发中能耗、物耗、污染排放量,严格限制审批,并且要坚决杜绝已被淘汰的项目以所谓技术改造、拉动内需为名上项目;严格按照总量控制的要求,把污染物排放总量作为区域、行业、企业发展的约束条件。

王文彪委员:

## 解决生态与民生问题的最佳结合点

本报讯(记者沈刚)“沙漠可以变害为利。”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亿利资源集团公司董事会主席王文彪委员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向沙漠要效益,是解决生态与民生问题的一个最佳结合点。”

“土细沙明放眼,朔风时来积成梁。连绵沙丘茫无路,惟见马蹄三两行。”这是十几年前王文彪初任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旗厂厂长时工厂周边的景象。1997年,他带领以盐厂为基础组建的亿利资源集团与地方联合,开始修筑穿沙公路。在造林护路中,又确定用甘草、羊柴、沙棘、沙打旺、沙柳等耐旱植物发展“沙产业”。

经过11年的不懈努力,如今,总长200多公里的5条柏油马路贯穿库布其沙漠北缘、黄河南岸,绿色的触角由公路两侧向沙漠伸去。去年仅以220万亩甘草为主的中药产业直接收入就超过5亿元。两年前,在亿利集团帮助下,分散在沙窝子里的36户牧民搬迁到移民新村,成为新型农民和旅游工作者,去年人均纯收入上万万元。

王文彪表示,他希望政府把沙漠产业列为生态建设的重点。“‘沙产业’可以遏制荒漠化,是解决生态与民生的有效途径。”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记者蒋茜)“乡镇医疗这块欠债太大,是目前医疗改革中政府最有可能做好,也最可能见成效的部分。”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对于医疗改革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以从乡镇卫生院改革入手。

此前一天,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透露,中央将下大力气加大医院基建,预计投入370亿元对全国70%以上的县级医院进行扩建。

对此,翁国星表示,“小病上卫生院不会太难也不会多贵,下一步应该多支持乡镇卫生院,提高医生待遇,改善医疗条件,这样乡镇的病人就愿意来看病。从大方向来说,也是合理利用资源,减轻大医院的压力,让大家感受‘看病不难,看病不贵’。”

“农民有没有钱看病是乡镇卫生院生存与发展的决定因素。”翁国星表示,乡镇卫生院的改革与发展除了硬件建设、人才引进等



马成志代表:

政府要为农民工  
就业创业搭建三座桥

3月11日傍晚,讨论一天的卢克松代表和马成志代表(左)意犹未尽,在驻地仍谈论农民工话题。马成志代表说:“政府要为农民工就业创业搭建三座桥:信息桥,让农民工及时掌握用工需求;职介桥,免费为农民工介绍岗位;培训桥,帮助农民工提高就业技能。”

本报记者 许之丰 摄

■本报记者 蒋茜

“公共资金被挪用或滥用,违背民意的形象工程、奢侈浪费的职务消费、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凡此种种,都与财政不透明、缺乏公众和制度的监督有关。”在3月9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会上,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在有关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发言中表示。

他认为,在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各级政府拟动用巨额刺激经济之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财政信息的公开尤为迫切。从上海市人大代表到全国政协委员,蒋洪已经为财政信息公开的目标奔走多年。去年他就提交了一份充满激情的大会发言稿,题为《阳光财政,我盼出头发了白》。今年,他终于如愿登上了发言台。

此前,他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刚刚发布了近期对我国31个省级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情况所作的调查报告。结果表明,在这项研究所设定的113项调查信息中,公众能够获得的信息平均不足25项。“该项研究只是考察财政信息的可获得性,没有涉及这些信息的规范性、可靠性与及时性。也就是说,即使按最起码的标准来衡量,我国财政透明度也是非常低的。”蒋洪说。

最新统计显示,去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5.13万亿元,财政增收1.5万亿元,若平摊到13亿人身上,相当于每人多收入1000多元。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就表示,“财政收入要合理使用,制度建设最为关键。”而在蒋洪看来,

## 政协委员蒋洪发言台上疾呼“阳光财政” 提高财政透明度 防止公共资金被滥用

“当前各级政府拟动用巨额刺激经济之时,保证财政信息公开尤为迫切”

让公众知道政府是怎么花这些钱的更重要,因为“透明是防止公共资金被滥用的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蒋洪介绍说,人民共同拥有并委托政府进行管理的资金从性质上来说应该包括三类:(一)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使用的资金;(二)政府为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标准、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资金,也就是各种社会保障基金;(三)政府投资于生产经营活动所占用的资金,即经营性的国有资产。

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正式实施。然而,“目前的情况是,第二和第三类资金的有关信息尚无系统的政府报告制度,而对于第一类资金,只是提供了其中的一部分,即预算内收支,另一部分作为预算外资金没有体现在政府的财政报告中。”蒋洪说。

他指出,政府的预算科目分为类、款、项、目、节五个层次,而目前的政府财务报告通常只反映到“类”,仅有部分反映到“款”,不能对该项支出的构成以及具体安排适当与否作出判断。

蒋洪带来的建议是,切实贯彻落实已经颁布并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真正做到“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通过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向公众报告财政信息;将政府信息公开和财政透明度作为各级政府问责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表示,政府财政信息的公开必须要有法律保证,建议尽快修订预算法。

“没有信息公开,什么监督政府、预算审查都白搭。”蒋洪委员说,“实现财政透明度目标不需要很多额外成本,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已为政府信息的公开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现在更需要的是制度改革的勇气决心和对全体人民负责的精神!”

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代表:

## 高科技公司扩张要高度重视股权激励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记者王四新 张伟杰)3月11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时,深情回忆联想集团发展成功之路。他说,高科技公司投资要高度重视股权激励,这也是联想成功的秘诀之一。

1984年,中科院投资20万元成立联想公司。20多年过去,当年的联想已经成为世界最著名的五大电脑公司之一。今天下午,柳传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科院虽然只投资了20万元,但是,给联想最了不起的帮助“是当初创业的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是科技改革的先锋。’”

也就是这“一句话+20万元”成为联想最可宝贵的财富,一路支撑着联想不断壮大。柳传志说,联想的成功,其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科院的完全信任和事务的“不干预”。

条件:一是公司人事权;二是公司财务权,合法经营情况下,公司自主支配财富和投资;三是公司运作权。

据介绍,中科院真的做到了对联想公司的三个“不干预”。联想公司虽然也经历过不少坎坷,但是,总的来说,三个“不干预”,使联想有了超过别的公司的机制优势,获得了放手发展的机会。

更让人意外的是,“开明”的中科院不仅不干预联想的日常发展,还主动关心联想的股权改制。1993年,中科院领导主动找到联

想高层,讨论联想创业者股份问题。由于涉及到国有资产保值等敏感问题,中科院主动采取变通方式,利用大股东的权限,将企业部分利润作为企业分红奖励创业员工,并成立了员工持股会。2001年,联想员工成功将公司35%股权买下,成为联想的合法股东。

“高科技公司要十分注意激励机制建设,否则很难成功。”柳传志深有感触地说,因为,高科技公司主要靠科技人员的智慧、能力生存发展。没有合理的激励机制,就很难留住人才,保持企业可持续发展。

## 武钢在金融危机中的选择 加快“第三次创业”